

该怎么看“会议专用平板电脑”？



今日头一评

京晚时评投稿

E-mail:jingwanshiping@163.com

19日开幕的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第五次会议上，常委会委员们的手上多了一样装备——人手一个平板电脑。广东省人大方面透露，这批平板电脑为统一采购，从下次常委会起，平板电脑有望取代纸质会议材料。不过，常委会办公厅信息中心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由于刚刚投入使用，管理系统只能用于基本的会议文件浏览功能，不排除未来将开发更多功能。

(11月20日《新快报》)

大会小会，材料一堆。中国有着文山会海的传统，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从五颜六色的秩序册，到字号很大、间距很阔的排版，越是重大活

动，越是在文本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今年2月份的《光明日报》举了个例子，说北京某大学学生肖亮协助导师组织了一场大型会议，结果发现，每位与会者领取的资料，加上附赠的笔记本，摆起来足足有10厘米高；而这些材料如果全摆起来，高度将超过六层楼。当然，公务会议可能不至于如此奢华，但纸张浪费上的做法，也只是程度有别而无性质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以“会议专用平板电脑”替代了传统的纸张铺陈，确实功德无量。时日长久下去，拯救的不仅仅是树木或森林。更令人欣慰的是，政府采购的平板电脑属于正品国货，似乎没有贪大求洋的取向。只是，初衷良好的举措，还是引来不少的争议。

仔细琢磨一下，争议也不是没有道理：一者，今天的“会议专用平板电脑”，性价比真很高吗？媒体查询了网上商城的同款笔记本价格，最便宜的配置大概也要2000块

钱左右（这还不是官方指导价）。即便以2000块钱计算，在“反四风”、转作风、开短会的背景下，以每场会议20块钱的文字资料计算，至少100场会议后，才会实现使用效益上的溢价（这还不包括100次使用中的宕机、维修等可能）——这得要等多少年呢？此外，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悖论——如果会议的文字资料越多，平板电脑越容易收回成本，但这说明会议开得繁文缛节；又如果会议的文字资料本来就寥寥，平板电脑就反而可能是另一种浪费，这就说明在电子办公上错过了成本收益。二选一，很纠结。

二者，就像不少网友说的，别赶上时代节奏的领导，就是普通工薪家庭，有个平板电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开会的时候让大家都带上不就成了，何必还要单独配发呢？再说，从功能上看，基本也就是看看文件、读读资料，智能手机的海量阅读软件都能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当然，理论上说，“会议专用平板电

脑”是办公用品，只是，在全世界的职场，除非涉密部门和行业，员工自带电脑上班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像现在的手机，其实也是办公必备，但因为人人有了，实在没必要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为公务人员另配，那么，功能相对单一、内容较为开放的“会议专用平板电脑”，为什么不能身先士卒地自备呢？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据说在今天的会议上，“还是有不少委员不太习惯用平板电脑，大多时间都在翻阅纸质文件”。阅读习惯与技能的养成，显然不是发个平板就能了事的事；但如果平板与纸质材料“比翼齐飞”，电子化会议的价值又在哪里彰显呢？

这些看似吹毛求疵的问题，并非要否认电子化在公务领域发展的规律。只是，如何算好账本、排好步骤、想好办法，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无纸办公虽好，但千万别走向“硬件依赖”的极端，更不能沦为不计成本的形式主义。 邓海建

莫让张艺谋等名人成为超生“土豪”

记者19日从江苏省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媒体曝光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引起该委高度重视，他们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和陈婷，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去找张艺谋，但未果。

(11月20日《南方都市报》)

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经媒体曝光之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然而，时隔半年之久，公众非但未能等来一个查处结果，反而等来了一个“零真相”——承担“属地管理”责任的江苏无锡计生部门沮丧地回应公众：虽然他们“高度重视”，并经过了“千方百计”的努力，但至今未找到张艺谋和陈婷的行踪，莫非张艺谋一家从人间蒸发了，或去了世外桃源？

时至今日，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仍然是“零真相”，这显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结果。然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无锡计生部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调查工作毫无进展，行政慢作为、甚至不作为，还要在公众面前“邀功”，一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做派。找到张艺谋果真这么难吗？应该说，在当今严密的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下，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一个普通的“超生游击队员”，也并非难事，更何况张艺谋是名人，是公众人物。由此，不得不让人产生如此遐想：计生部门不是找不到张艺谋，而是不想找到他，或者不敢找到他。

既然无锡计生部门无力承担起计划生育“属地管理”的社会责任，既然他们不想或不敢查处张艺谋涉嫌超生事件，不想或不敢斗超生“土豪”，那么，国家计生委等有关部门，不能再坐视不理，应对张艺谋涉嫌超生事件展开联合调查，尽快还公众一个真相。 张西流

重罚信用卡透支 难避敛财之嫌

近日，陈先生在办理银行贷款购房时，因信用记录不良而被拒，原因是6年前他透支了信用卡900多元一直没还，且6年来他因不断更换住址和电话号码，银行多次告知未果。如今他的欠款已经“暴增”20倍，变成了1.9万多元，使其变成了“卡奴”。不仅如此，他贷款买房的计划也泡了汤。

(11月19日《华西都市报》)

根据陈先生的描述，此前他是知道这900多元的透支款的，之所以不还，也许出于一种不在乎的心理，觉得还与不还无所谓，脑子里没有信用记录的概念，也不会想到一个数十倍的罚单在等着自己。如今陈先生不仅面临着巨额罚单，更重要的是，贷款买房也受到影响。出现如此后果，首要责任当然在陈先生自己。

像陈先生这样，对信用记录漫不经心的人还真不少，特别是对一些数目少的钱，更不愿放在心上，总觉得不拘小节坏不了大事。正是由于许多个陈先生漫不经心的行为，才导致社会整体信用记录不佳。因此，要想提升社会的信用水平，就必须对陈先生这样的人给予惩罚，让他们付出失信的代价，否则，社会诚信缺失，不仅影响金融体系，对各种社会活动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不讲信用的人太多，生活就没有安全感，人们生活在相互的猜忌当中，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对失信行为处罚很有必要，但并非越重越好。900多元的透支，6年就变成了1.9万多元，如此增长幅度令人咋舌。不管以复利形式计息是否合理，银行想尽办法多罚息的做法已明显可见，给人的印象是，重罚透支不是为了建立起信用体系，而是靠此敛财，如此罚息将给银行带来丰厚的利润，你就不能排除银行会希望一部分人透支后失信。

重罚不仅不利于建立起良好的信用体系，而且会对信用造成伤害。因为责罚不对等，就会给人烙下不公的印记，无节制地重罚难避敛财之嫌，也很难让当事人以自觉守信来回应。唯有处罚适度，并给予其改正的机会，才能使漫不经心的人一改过去的不良习惯。当然，对于用户来说，保护自己不能单靠银行管理有多么温情，自己首先不失信于人，树立信用意识，自觉维护好自己的信用记录，才能免遭不良信用记录影响生活。

唐传艳

官升副厅长靠送房 抱团贪婪终泡汤

广东茂名市政府原市长助理雷挺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已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刑16年。雷挺为谋取时任茂名市长罗荫国的关照，曾向其行贿一套住房，后终获提拔为副厅长官员。此外，他还在审批房地产项目过程中，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致国家损失逾亿元。

(11月19日《羊城晚报》)

贪官们的目光中，权力与金钱之间存在着价值和价格上的某种换算关系。于是乎，买官卖官、行贿升官就成了官场潜规则中最肮脏、最卑鄙的内容之一。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原广东茂名市长罗荫国，正是这么一个不但谙熟而且运用这条潜规则到了出神入化境地的大贪官。他的部属雷挺算得上顶级官迷，摸透了这名上司的心机脾性，投其所好，悄悄进贡了一套商品房给他。见



房眼开的市长，当然心领神会，很快将此部属提拔成副厅长市长助理，演了一出投桃报李的丑剧。有道是：宏图大展青云上，官升副厅长靠送房；抱团贪婪享腐败，孰料美梦终泡汤。行贿求官的下属与受贿官的上司，落得了同样下场，都成了法律制度的阶下囚。曾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兴起并猖獗的买官卖官

现象，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得以死灰复燃，甚至在某些角落呈现卷土重来的态势，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而要治理这一顽疾，除了坚决落实反腐倡廉的相关举措，别无他途。清除罗荫国、雷挺之流地方上的腐败“老虎”“苍蝇”，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大业扫清障碍，也为民众除害，人们拍手称快，理所当然。

文并图 吴之如

“花6万学情商”看点不在钱上

在湖北武汉的崇仁路小学，11岁的杨瞻闻算得上名人，从一年级起陆续担任班长、中队委和大队委，如今刚刚被同学们一致选为“学生校长”。“这孩子成绩一直列班级前3名，情商非常高。”五(3)班班主任谭小明老师说，班级同学之间有纠纷，肯定是由他来调解。杨瞻闻的妈妈介绍，“在儿子的情商培养上，已经花费了6万余元。”

(11月19日《现代快报》)

向校长提建议被采纳、调处同学之间纠纷、被同学公推为“学生校长”，杨瞻闻“高情商”的优秀表现令人称道。不过，面对其家长为孩子“3年花6万学情商”的“异常”举动，许多网友提出质疑。

其理由不外有三：其一，不是每个家庭都如这位家长那样“家境殷实”，可以每年拿出数万元钱供孩子训练情商；其二，情商不是花钱买出

来的，而是一个需要渐次培养的教育发展过程；其三，不能以大人功利的心态培养孩子，这样的“情商”教育势必会误入歧途。

平心而论，人们的这些质疑微词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整个教育体制尚未完全摆脱应试教育桎梏的语境下，这位家长积极尝试对孩子的“情商”教育、并敢于为此投资付费的探索精神难能可贵。尤其是“我希望从小培养儿子的情商，反倒是奥数、作文培优等可以缓一缓”的别样认知，更是在抱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心理、热衷于为孩子“择校”、“报班”跟风行为的众多家长中独树一帜。

这种与素质教育合拍的观念更新值得肯定。

在诟病应试体制、崇尚素质培养的当下，人们对情商训练缺失的教育短板有目共睹。尤其是独生子

女一代表现出的高智商、低情商状况，比如性格孤僻、意志脆弱、缺乏感恩、不耐挫折等人格缺陷，更成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的社会隐忧。

但是看清病症并不等于获得了治病的良方。现实生活中，鲜见有人为打破困局而身先士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家长的投资情商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破冰与导向效应。

其实，情商培养也需要“从娃娃抓起”，甚至应当先于智力开发。《弟子规》“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的开篇总叙，讲的就是“先做人后做学问”的道理。而卡耐基对“成功等于85%关系能力加15%专业能力”的解读，更直白了情商教育的重要性。期待“花6万学情商”育儿导向，能够激发人们对情商教育的关注与践行。

张玉胜

以开放心态看待“土豪”进牛津词典

近日，牛津大学出版社双语词典项目经理朱莉·克里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Tuhao（土豪）”“Dama（大妈）”和“Hukou（户口）”等词语已在牛津英语词典编著者的关注范围内。

(11月19日新华网)

对于“土豪”携手“大妈”或进牛津词典，有人将之归结为中国影响力提升的体现，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有人认为这些词汇本身带有贬义或嘲讽意味，或对中国人形象有所损坏。在我看来，我们还是以平常心态、开放心态看待“土豪”携手“大妈”走进牛津词典为好。语言就是社会现象最快、最生动的反映，词典有必要记录。

应该承认，“土豪”等新汉语词汇的出现，确实是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使然。词汇本身无关好坏，我们大可不必做“语言警察”来审查词典。难道说牛津词典不收录“土豪”，外国人就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土豪”群体存在？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更多英语使用者来到中国，或在工作生活中与中国产生密切接触，中英两种语言互相渗透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汉语渗透进英语的情况不在少数，比如“Maotai（茅台酒）”、“Chinglis（中式英语）”、“guanggun（光棍）”、“chengguan（城管）”等，这反而说明了英语的包容性非常强。对我们而言，即便“土豪”一词在世界走红，也会是瑕不掩瑜的。何勇海

本版言论皆为一己之言，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